

新中国学习外国科技的转向(1956—1966)

张 静

〔摘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冷战时期中国对外科技交流的方针大致经历了由“向苏联学习”到“向外国学习”的转变。这既非中苏交恶后的被动调整，亦非动乱困局中的被迫求存，而是恰值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向苏联学习”的最高潮。其历史语境主要包括缓和有利的国内外局势和中国领导人乐观自信的心态。1956 年至 1966 年，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技人员的跨国交流不断开展，科技文献的跨国流动也初步制度化。

〔关键词〕“向外国学习”；科技人员交流；科技文献流动

〔中图分类号〕K27；G32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9)-09-0028-12

The Shift in Learning Foreign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6—1966)

Zhang Jing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elf-reliance, China's poli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during the cold war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from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to "learning from foreign countries." This was neither a passive adjustment after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nor a forced survival in turmoil and dilemma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just in the climax of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mid-1950s. Its historical context mainly includes the relaxation of favorable domestic and foreign situations and the optimistic and confident attitudes of Chinese leaders. From 1956 to 1966, the transnational exchange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were continuously carried out, and the transnational flow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were also preliminarily institutionalized.

冷战时期，在坚持自力更生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中国科技对外交流大致经历了由向苏联学习到向包括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外国”学习的转向^①。20 世纪 50 年代，通过大批聘请苏联专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和技术人员赴苏考察进修，大量翻译苏联各类科技文献和引进技术设备，中国国内掀起了学习苏联科学技术的高潮^②。在科技领域，中国学习的对象由特指苏联转向泛指外国，无论在语义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既非缘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中苏交恶、学习苏联受阻，亦非萌发自“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局，而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全面向苏联学习最高潮之时便

北京大学人才启动项目(7101502166)的阶段性成果。

- ① 学界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外科技交流的研究，大多关注中苏双边科技合作与交流的过程，并从国际和国内因素分析双方合作破裂的原因。而在中苏科技合作出现分歧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对向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外国”进行学习的号召及其历史语境，则并未受到学界足够重视。
- ② 沈志华总结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中国向苏联学习的三种途径；张柏春等考察了苏联对华技术转移的历史；高白兰(Izabella Goikhman)借助跨文化转移的分析范式，分析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学术互动的实践及其背后的中国政策，意图挑战既有中苏学术交流研究中的“冲击—回应”范式，强调中苏学术交流中的互动性。参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335—336 页；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年；高白兰《中苏在 1950 年代的学术交流：质疑“冲击—回应”模式》，白思鼎、李华钰编《中国学习苏联(1949 年至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329—358 页。

* 本文是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

已发生^①。

本文在厘清“向外国学习”的内涵与语境的基础上，将科技人员的跨国交流与科技文献的跨国流动作为考察科技领域“向外国学习”的两个主要方面^②。前者包括各类外国专家的引进，以及科技人员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展开短期访问，参加培训，出国留学等；后者包括科技文献的多边互换、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带回、直接订购，以及通过第三方、第三国间接购买等。通过梳理分析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冷战背景下中国科技领域对外交流学习的态势，本文将探讨新中国学习外国科技中的“变”与“不变”。

一、“向外国学习”的内涵与语境

论者在阐述中国领导人“向外国学习”思想时，大多溯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然而，若从政治与执政思想上追溯，这种转变的发生或许更早。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话，论及是否以及如何向外国人学习，质疑有些人持有的“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用夷变夏’，就有问题”的观点。在他看来，向外国学习的目的既不是“用夏变夷”，也不是“用夷变夏”，而更似“洋为中用”。他说：“社会主义不是出在俄国，俄国也学会了。外国的好东西，我们统统拿过来，变成我们的东西，要在一、二十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他还以汉唐乐舞为例论证道：“汉朝、唐朝就是这样的，唐朝奏乐舞蹈有七种，有六种是外国的，唐朝很有名，搞久了就变成中国人的。”^③

为了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中国需要知识分子，需要科学技术。在毛泽东看来，发展先进科学技术是新中国在工业上、军事上摆脱对外依赖的前提，也是应对现代战争、保障国防安全的基础。他说：“我们吹牛皮吹不起来，工业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重要的工业装备和精密机器都不能制造……现在打仗，飞机要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这就需要依靠大批科技人员、知识分子，“先接近世界水平，然后赶上世界水

平”。我们“应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他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④

周恩来在此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更明确地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高度技术”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科学是关系中国国防、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一起，无论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所以，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然而，中国科学文化力量的现实状况却是“比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小得多，同时在质量上也要低得多”，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鉴于此，周恩来强调：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最终目标是“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为了实现此目标，周恩来号召：“我们必须首先打破那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

① 关于中苏科技交流从合作到分歧的时间，至少有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1956年苏共二十大特别是波匈事件后、1960年苏共中央全会三种说法。参见李滨《“三扁担，扁担三”：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1950—1957）》，白思鼎、李华钰编《中国学习苏联（1949年至今）》，第329—379页；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第210—214页；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第349—354页。

② 本文借鉴了高白兰提出的国际学术交流的三个主要层面——政治政策、实践和话语形成，但限于篇幅和资料，包括设备引进的实践、专业性学术话语的形成、两次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的实际执行等问题，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

③ 《学习文选》，出版社不详，1967年，第106页。

④ 《学习文选》，第108—109页。

依赖思想”，“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要“作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有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果”。总之，要“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在“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下，制定《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加强理论科学研究，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图书、资料，改善外国书刊进口工作，扩大外语教学和外国书籍翻译等问题，也被一一提出。^①

从上述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此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来看，科学技术被视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安全的关键，而向外国学习是中国缩小并最终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重要途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技领域，苏联不再是“无限期地依赖”的对象，“其他国家”也被当成中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目标。会议结束后，1956年1月30日，《人民日报》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毛泽东同志号召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为题，在第一版报道了这次会议以及毛泽东的讲话。很快，“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席卷全国。

三个月后，毛泽东先后在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谈“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这被认为是毛泽东“向外国学习”思想的经典表述。^②从目前能够找到的三个版本的论述来看^③，其所呈现的语意共通之处有五条：其一，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提得对”，但要坚持两点论——一切国家、每个民族都有长处和短处，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学习的方针是“长处都（要）学”，“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其二，不要学短处，也不要毫无主见地跟风。其三，要学的是普遍真理，但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批判教条主义。其四，中国有两条缺点，但同时也是两条优点：一方面，中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感觉事事不如

人，“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轮不到我们来骄傲，不过，一为“穷”，二为“白”，一张白纸，正好写字。其五，将来“工农业很大发展了，科学文化水平大为提高了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9—160、181、182—183、180、189、167、185页。

②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有学者援引《论十大关系》讲话中第十部分“中国和外国关系”的内容，论证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其论述中一个重要的逻辑便是毛泽东主张向国外学习。不过，其所赖以分析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文本，均为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全面整顿时为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5卷而让胡乔木整理的稿本，亦即1976年12月26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版本。该版本随后被《毛泽东年谱》《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辑录。而目前已知，除了两次会议记录的未刊稿本、其他领导人的传达阐释本外，至少有三个下发传达稿本。经过不同整理者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删改、增添后，想要由1976年12月26日公开发表本探求讲话原貌，自然是十分困难的；况且因为毛泽东本人不同意，几个版本未能在其生前正式公开发表。总之，今人以1976年公开本分析毛泽东1956年时的思想，难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参见张建勤《论毛泽东关于“向外国学习”的思想》，《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文英《“向外国学习”：毛泽东的一种对外战略思想》，《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陈胜余：《略论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王海光《〈论十大关系〉文本的形成与演变及其经典化》，《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3期；李桂华、齐鹏飞《毛泽东生前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的原因》，《党的文献》2018年第5期。

③ 1956年四五月间两次讲话的记录稿在此后20年间被多次修改成不同稿本。这里所说的三个版本是：1956年4月25日的记录稿、1965年陈伯达整理的版本（参考“文化大革命”时期流入社会的由群众组织编印的出版物），以及1975年胡乔木主持修改并印发全党的讨论稿本即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本。不同稿本的差异可以用来厘定毛泽东思想的变化及政治情势的变迁；其共通之处则能够呈现毛泽东1956年已经成型的思想与观念历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依旧大致未改的本相，有助于后人参透其根本意旨。参见《邓力群自述（1915—1974）》，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7—273页；《学习文选》，第131—133页；《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44页；王海光《〈论十大关系〉文本的形成与演变及其经典化》，《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3期。

(国家富强了)”，也还是要谦虚谨慎，还是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一万年都要学习。^①

显然，第一条的两点论是看待外国的基本原则；中间三条分别强调对于外国不学什么、不要怎样学，要学什么、要怎样学，以及看待中国自身也要坚持两点论；最后一条确立了中国如果学会了、大发展了、富强了该如何自处的原则，特别提出要警惕“翘尾巴”。三个版本的论述前后跨越20年，对毛泽东“向外国学习”思想的呈现虽有所不同，但核心要旨一致：要在坚持两点论的基础上向世界上一切国家、每个民族学习，也就是为了中国的发展与富强，不再只是全面向苏联学习^②，还要有选择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而需要学习的时限则是“一万年”。^③

此时正值全面向苏联学习的高潮，毛泽东却发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号召，其所释放的微妙信号，很快被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B.利哈乔夫敏锐地捕捉到。1956年8月22日，他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附件《关于毛泽东所提出的十项方针》中提出：“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毛泽东关于利用苏联经验的指示……毛泽东强调，中国应该向所有人学习，其中包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人家的好东西。”他结合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描述了自己观察到的迹象：“除了学习苏联和民主国家的经验，现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1956年，中国派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增多。1957年计划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多一倍的书籍。”此外，他还敏锐地发现：“在最近半年里，在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里出现一种倾向：号召以批判的态度利用苏联的成果。作为这一立场的依据，经常提出要反对机械地把苏联的经验搬到中国，反对中国工作人员忽视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形势的特点。”^④

1956年不仅是中国领导人号召“向外国学习”最多的一年，而且大约也是从这时起，他们对于谁是要学习的“外国”、为何学习、如何学习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开始发生微妙改变。在厘清语义之外，发生这种变化的历史语境及其

呈现出的中国领导人的心态，可从三方面分析。

第一，从当时中国的外交状况来看，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政府第一次参加重大国际会议，并促成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协定的签署；1955年的亚非会议是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一次重要实践，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第一次台海危机的较量打破了美国的军事讹诈和“两个中国”的外交图谋，解放军收复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启，暂时缓和了台海紧张局势，中方提出了愿与美方就缓和远东局势、开展两国人

① 括号中的内容是1976年公开本添加或修改的。此外，在1965年本里，没有第一点中“我们的方针”和第二点中“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等内容。

② 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后，中央领导人纷纷发表谈话，强调不要盲从和迷信，不要一切依赖专家，学习苏联经验要有分析。参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第210—211、225—226页。

③ 具体分析三个版本第十部分“中国和外国关系”的内容，在1965年稿本中没有而在其他两个稿本中出现了的，共有四条：其一，对待资本主义国家要区分“腐败制度”与“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对于前者的批判不妨碍对于后者“好好学习（好好学过来）”。其二，“对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三，“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笔者无法确定这一点是否出现在1956年稿本中，但1976年12月《人民日报》公开本中肯定是有。）其四，在讲中国因为“革命是后进的”所以“轮不到我们来骄傲”一句后，增加了几句话：“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此外，1965年稿本中在谈到一穷二白的状况时，有几句话是另外两个稿本中没有的，包括“我们穷得很，又是知识不多。”“当然，我是就大概而言，我国劳动人民有丰富的智慧，而且已经有一批不错的科学家，不是说都没有知识。”“一穷二白，使我们的尾巴翘不起来。”

④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6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325页。

民往来及文化交流、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采访等建议。在和平外交占据主导地位、外部环境趋于缓和的境况下，毛泽东于1956年初作出“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维持和平”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论断，认为和平的局势有可能让我们有12年时间，来基本上完成工业化^①。正是在缓和、有利的外部局势下，中国领导人拥有了不惧“用夷变夏”的心态和重现汉唐气象的魄力。

第二，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已呈高歌猛进之势，自信与乐观是中国领导人不惧“以夷变夏”心态的底色。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两天后，毛泽东在1956年1月22日会见外宾时说：“你们要看我们的落后，看落后如何向前进行，怎样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向工业国前进。我们现在不好，但将来会好的，我们是有希望的。”“这是从古至今的一条基本原则：弱小而进步的战胜强大而落后的。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各国经验可以互相交换，哪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验。”1956年4月10日，在同丹麦首任驻华大使谈话时，毛泽东又说：“我们很愿意向你们学习，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②1956年8月30日，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指出：“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③

第三，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接连兴起，科技界知识分子思想中“亲美”“崇美”等所谓“洋奴思想”被清理。在全面学习苏联科学的大潮中，苏联科学界对某些科学理论的批判也被一同引入中国。^④在不断高涨的政治运动中，高校与科研机构中的党委、党员、团员与“旧教授”，特别是留学欧美的非党员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越发严

重，后者的政治地位、学术地位岌岌可危，以至于性格温和、行事平淡的周培源在1954年9月同北京市高校党委办公室来调查的人员对话时，说出了一段有些“出格”的话。他说：“科学工作者如何发挥作用问题，至今未很好解决，几年来科学工作者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觉得发挥力量不够，英雄无用武之地，怀才不遇，心里总是很不开朗。这种感觉很普遍，觉得党没有把我们的才能肯定下来。”^⑤不过，当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又很快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没有他们就不行了，单是我们这些老粗那就不行。要向我们的党员作广大的教育。”第二天，他特意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道听取了中科院四位科学家的报告，并提议“今后每月可组织两次这样的科学报告，对大家都有好处”。^⑥中国科技界“百家争鸣”的短暂春天很快就要到来了。

二、科技人员的跨国交流

科技知识的跨国流动归根结底要以人为载体，科技人员的跨国交流是分析新潮旧浪此起彼伏之波涌的最佳切入点。

第一，从派遣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出国参加学术会议、考察、进修以及派遣留学生的情况来看，在日内瓦会议前后，中国政府便已开始设法通过出席国际会议和各国学术会议、考察访问等方式，加强科技人员与西方国家科学家

①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17页；《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页；《学习文选》，第108页。

②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16—517、559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7、89页。

④ 王扬宗《思想改造运动与20世纪中国科学的转折——以科学家的自我批判为中心的初步讨论》，《中国科技史杂志》2016年第1期。

⑤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43页。

⑥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15、516页。

团体的接触^①。以中国科学院为例，按照出席各国学术会议、考察访问两种形式统计，1955年至1957年，与中科院开展双边科学技术交流最多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占比达93%；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分别为印度（3批次）、巴基斯坦（2批次）、日本（2批次）、法国（1批次）。与之相比，中科院派遣科学家出席国际会议的批次尽管很少，但增速很快，其

中1956年更是多达16批；目的地方面，近90%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4批次）、比利时（4批次）、法国（3批次）、荷兰（2批次）、瑞典（2批次）、芬兰（2批次）、意大利（2批次）、英国（1批次）、西班牙（1批次）、瑞士（1批次）、加拿大（1批次）、爱尔兰（1批次）、奥地利（1批次）、葡萄牙（1批次）。

表1 中国科学院派遣科学家代表（团）出国情况统计（单位：批次）

	出席国际会议		出席各国学术会议		考察访问	
	总计	非社会主义国家	总计	非社会主义国家	总计	非社会主义国家
1955年	3	3	21	2	6	1
1956年	16	15	36	3	9	0
1957年	10	8	29	2	9	0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年）》，内部印行，1956年，第212—213页；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年）》，内部印行，1957年，第312—317页；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年）》，内部印行，1958年，第392—396页。

中国科学家赴西方国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是打破封锁和突破孤立的重要方式。然而，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为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既成事实，竭力支持台湾方面更多参与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和学术会议。为了打破美国的图谋，大陆科学家不得不拒绝参加有台湾学者出席的国际会议。^②例如1955年8月，第一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由于美、英两国政府不承认所谓非联合国成员国的“分裂国家”，并坚持邀请

台湾与会，大陆科学家最终未能参加这次会议^③。不过，对于以科学家个人而非国家行为体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国科学家不但能够积极参与，而且在会上还敢于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科学家接触。1955年八九月间，41个国家、600多位科学家参加的国际天文协会第九届大会在都柏林举行，三位中国科学家出席会议。回国后，中科院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科学通报》^④刊登了天文学家、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参加此次国际会议的报告。张钰哲称，

① 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党组于1953年11月19日呈送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其中提出要“团结科学家”。中共中央的批示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事业的基本政策，首次提出建设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包括高等学校和各生产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在内的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体系的方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在科技方针政策方面的奠基性文件。在1954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英国、日本在内的多国科学、文化代表团访华，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物理学家J. D. 贝尔纳还在访华期间受邀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作了一系列专题报告。1955年12月初，中国科学院1955年抗生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苏联、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越南、日本、缅甸、印度尼西亚、朝鲜、丹麦等11个国家的12名科学家应邀到会。这是中国科学院首次广泛邀请国外科学家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学术会议。参见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9—41、60—61页；叶逸征《各国科学家来我国作友谊的访问》，《科学通报》1954年第11期。

② 参见张九辰、王作跃《首次国际地球物理年与一个中国的原则》，《科学文化评论》2009年第6期。

③ 参见涂长望《关于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的报告》，《科学通报》1955年第12期。

④ 《科学通报》是中科院编译局主办的综合性刊物，1950年5月15日创刊，主要报道与介绍中央人民政府的科技政策、中科院内外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工作概况、生产技术部门的活动、国际重要学术动态、国内外科学的发现与发明，以及学术论著受到的评价等。参见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第12、30—31页。

他们的学术报告及闭幕聚餐会上的发言获得了与会科学家代表的积极回应。“席散出场时还有些人特地走来同我们握手。有几个和我们同住一个旅馆的美国天文学家，平日同车赴会彼此并不交谈，可是这天席散归来，其中有两人自动地来向我们致意。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天文通俗期刊《天与远镜》的主编人，他表示欢迎我们写关于中国古代天文的稿件寄到他的期刊里发表。”^①这篇报告能够公开发表，表现出期刊编辑者对于报道与美国科学家接触的坦然之态，以及万隆会议之后中国对美政策的灵活之姿。

在“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下，1956年4月1日至4日，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第十六届执行理事会及世界科协成立十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来自除美国之外的17个会员国的1400多位科学工作者齐聚北京。大会讨论了促进各国科学界相互接触、促进国际科技合作、扩大世界科学影响等问题，各国科学家还参观了中国有关科学研究单位和大学。^②

此后，中国科学家更加积极地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家的接触。《科学通报》不但陆续刊登有关中国科学家赴国外参加学术会议并且与西方国家科学家接触、交流的报道，而且其行文无不秉持科学国际主义的精神。1956年5月23日至31日，苏联科学院物理数学部和莫斯科大学联合召开的磁现象物理学会议在莫斯科举行，约30位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出席会议。在发表于《科学通报》的参会报告中，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特意详细介绍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奇普(A. F. Kip)报告的内容，并写道：“各国的科学家们进行了友好的和密切的接触，增进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在会议期中，中国代表团……还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③

三个月后，国际土壤学会第六届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52个国家的7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中国派出了由全国甚至世界知名的土壤学家马溶之、侯光炯、黄瑞采、侯学煜、陈华葵、朱克贵六人组成的代表团。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土壤学类国际会议。六位科学家共

同署名的会议报道对于国际土壤学界的新进展毫不吝惜溢美之词。他们写道：“通过这次会议，我们认为土壤科学在最近20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对比新中国土壤科学事业，报道在肯定“有了很大发展”的基础上，还大胆指出，我们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缺门和薄弱环节”，还有空白点。^④

与此同时，从1956年8月20日至9月15日，三位中国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吕保维、朱岗崑先后参加了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东欧区域会议、国际科学无线电协会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电离层会议、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在巴塞罗那召开的第四届大会等三个国际会议^⑤。其中后两个会议均有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西方科学家参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届国际地球物理年大会，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出席国际地球物理年大会。^⑥

在被美国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包围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家的出访是“人民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体现出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1957年，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被周恩来选派作为唯一一位中国科学家赴加拿

- ① 张钰哲 《参加国际天文协会都柏林大会报告》，《科学通报》1955年第12期。
- ② 赵宗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举行第十六届执行理事会和成立十周年纪念会》，《科学通报》1956年第5期。
- ③ 葛庭燧 《参加苏联磁现象物理学会议报告》，《科学通报》1956年第12期。
- ④ 马溶之等 《国际土壤学会第六届会议概况及学术活动》，《科学通报》1957年第2期。
- ⑤ 这三次会议是1957年7月1日至1958年12月底为期18个月的国际地球物理年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决定参加此次活动后，由于美国领导的组委会允许台湾参加，中国最终退出了后续的科学活动。参见朱岗崑 《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会议纪要》，《科学通报》1956年第12期；张九辰、王作跃：《首次国际地球物理年与一个中国的原则》，《科学文化评论》2009年第6期；Zuoyue Wang, “U. S. -China Scientific Exchange: A Case Study of State-sponsored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Beyond,”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Vol. 30, No. 1, 1999.
- ⑥ 朱岗崑 《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会议纪要》，《科学通报》1956年第12期。

大参加首届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便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例。周培源在帕格沃什大会上表示：“中国科学家急需与世界各国科学家合作。”“我们热烈欢迎与国外科学家的合作。”孰料美国科学家外斯科夫（Victor Weisskopf）当场表示希望访华。周培源马上说：“我答应你，我不仅欢迎你，也欢迎其他各国科学家们访问新中国。”在1959年第四届帕格沃什会议上，周培源在题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国际合作和发展》的发言中，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十年来，苏联、东欧及西方国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工作、中国派出留学生和技术人员到国外学习的情况，并表示：“我相信国际合作是促进相互理解，消除偏见，从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的可行之路。”借出访北美的机会，他还设法与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恢复联系，“为中美关系解冻后，美籍华人科学家立即组团访华奠定了基础”。^①

第二，从在华外国专家的构成上看，苏联作为新中国国家建设起步阶段主要师法的对象，

在20世纪50年代无疑是中国引进先进智力的主要来源。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中国共聘请了来自70余个国家的1.5万余名外国专家（不包括专家的家属）。其中1949年至1960年6月，共聘请苏联专家12155人，数量居首；聘请民主德国专家821人，位居其次。不过，随着中苏关系交恶，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在华外国专家的构成发生了迅速、剧烈的变化：一方面，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人数骤减。1960年末，苏联在华专家仅剩418人。1961年至1962年，社会主义国家在华专家人数继续锐减至仅有8人。另一方面，常常被研究者忽视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专家的人数和比重从1961年起逐渐增加。至1966年6月，日本专家人数居在华外国专家之首，为222人；法国专家数量位居其次，为105人。^②外国专家构成的变化，体现出中国科学技术的外部知识来源的微妙转向：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逐渐取代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表2 在华外国专家人数统计（单位：人）

	社会主义国家 专家	资本主义国家 兄弟党专家	资本主义国家 专家	相当于专家的 外籍工作人员	总数
1961年1月	121	89	18		228
1961年12月	36	81	14		131
1962年第4季度	8	44		77	129
1963年	15	31		114	160
1964年第4季度					410 ^③
1965年10月底					1022 ^④

资料来源：国家外国专家局大事记编写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大事记》第2卷（1957—1961），内部印行，1994年，第205页；国家外国专家局大事记编写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大事记》第3卷（1962—1967），内部印行，1994年，第14、32、67、72、98页。

除了派遣中国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公开报道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的交流情况，以及

邀请西方国家专家来华之外，1956年、1965年，国务院先后两次批准外交部、高教部的请

① 周如玲：《周培源和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科学文化评论》2005年第6期。

② 国家外国专家局大事记编写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大事记》第3卷（1962—1967），内部印行，1994年，第135、42页。

③ 这410位在华外国专家来自55个国家，其中日本104人、法国47人、英国39人、智利30人、古巴15人、比利时11人、意大利10人、瑞士10人。

④ 这1022位在华外国专家包括文教人员449人、技术人员129人、家属444人。

示报告,分别同意在1957年向西方派遣少数语言类留学生,在1965年向不包括美国在内的法国、英国、瑞典、丹麦、荷兰、瑞士、挪威、意大利、日本等西方国家派遣自然科学留学生^①。在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尽管仍然受到美国在政治上与外交上的封锁和孤立,但中国领导人对国内外时局抱持乐观态度。在中央政策的鼓励下,中国科技人员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技人员的交流得以恢复和维系。

三、科技文献的跨国流动

从引进、翻译外国科技文献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尽管没有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直接开展科学技术合作的国内政治条件和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一些文献情报机构还是设法订购到大量西方科技与工农业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图书报刊资料。以中国科学院为例,中国科学院图书管理处(1951年2月改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在1950年4月成立后,便开始注重购买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书刊。不过,由于内部要对进口书目严格审批,外部又受到封锁,1951年国家只拨给外汇12.5万英镑,便已绰绰有余^②。1956年“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后,为了广辟书源和改变订购不及时的情况,国务院批准中科院图书馆直接从国外订书,并且在莫斯科、柏林、伦敦等地设立采购点^③。从当年起,中科院为购买资本主义国家书刊所支出的外汇猛增,1956年为180万英镑,1957年略有缩减但仍达到150万英镑。据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介绍,“这个数字,比日本、印度、苏联进口的数字都大”^④。从1958年到1962年,为了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宣传,当时中国负责进出口外国书刊的独家经营单位——国际书店集中全力对外出口,以至进口图书数量下降。1963年外文书店正式成立,成为图书进口和发行的专业书店,国际书店则改为专业出口书店。至1966年,中国购买资本主义国家图书报刊的外汇总额恢复到近107万英镑^⑤。

也是从1956年开始,科技文献的收集与编译工作得以制度化并迅速发展。是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后,中科院

副院长张稼夫和武衡在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谈及中科院对国际科学技术进展了解太少,且只注意向苏联学习,很少顾及其他国家。周恩来当即指示,要尽快建立科技文献机构。随后,他在中共八大上提出,为了“进一步密切国际间科学研究工作的联系和合作,收集和交换国内外科学和技术的资料”,要将中国科学技术文献工作提高到战略的地位上来。^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在1956年10月15日成立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由中科院编译出版委员会指导,负责搜集、整理和报道国内外特别是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发展情况与最新成就^⑦。1958年5月,国务院将国家技术委员会的情报组并入该所,使该所进一步扩大并加强,名称亦改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并附设科学技术资料馆。这使其成为全国科学技术文献事业的中心。该所同时接受国家技术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科学技术文献工作的任务是报道“科学技术领域内国内外的成就和动向”。当时认为,这项工作对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有着重要意义;科学技术部门开展的工业和农业技术改造,是中国在十年内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工农业产品产量在15年内赶超英国的“基础”。^⑧

随着“大跃进”的开展,“技术革命”运

- ① 参见胡中波《中美关系视野下的中美教育交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6年,第108页。
- ② 原文为35万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折合为12.5万英镑。参见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77页。
- ③ 白国应《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50年(续)》,《图书馆》1999年第4期。
- ④ 《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郭沫若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年)》,内部印行,1958年,第2、16页。按:武衡使用美元记录,数据稍有差异。参见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第277页。
- ⑤ 原文为300万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折合为107万英镑。参见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第277—279页。
- ⑥ 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第288页。
- ⑦ 参见白国应《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50年》,《图书馆》1999年第3期;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第276—279页。
- ⑧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科学情报工作(1958年文献汇编)》,内部印行,1959年,第1、3页。

动很快呈现“排山倒海、一日千里”之势，科学技术文献工作成为“党领导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一个工具”。不过，在通过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面向生产、“解决具体技术问题”的科技文献收集与编译工作之外，科技文献工作基本上坚持了“中外并举”的原则，即“既要抓紧国内土办法创造发明的搜集整理与传播，也要重视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成就”。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分别评述各产业、各学科的国内国际水平与发展趋向”的战略性文献工作以及一般国外科技文献搜集工作，一直由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及中央各专业情报机构承担^①，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短暂的停滞。

国外科学技术文献的搜集渠道有购买和交换两种。“为了扩大我国科学界和世界各国科学界之间的学术交流，促进我国科学的发展”，1956年9月25日，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五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著作国际交换的几项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按照《规定》，中科院“可以向一切国家的图书馆、学术机关或科学家个人进行交换或赠送”国内公开发行的学术性书刊著作，不过“对联合国、联合国专门机构或其他中国代表权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政府性国际组织，不主动提出交换；如在交换科学著作的同时，涉及对上述国际组织

承担义务的问题，则另行处理”。《规定》还一改此前由中科院图书馆统一办理与外国交换文献的方式，提出“今后除由院图书馆与外国图书馆及其他学术机关进行交换外，各学会及本院各研究机构均可与一切国家的研究机关进行上项书刊的交换或赠送”，并且“鼓励研究人员同外国科学家建立学术上的广泛联系，如交换个人的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科学著作等，应给予各种便利，不应加以限制。尚未在国内公开发表的科学著作在不违反国家保密的原则下，亦可向国外寄送”。^②至1958年，中科院科学情报研究所除了同苏联全苏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相应机构签订科技文献交换合作协定外，还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美国、联邦德国、日本、法国、瑞士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3767个学术团体和科研机构建立联系，其中建立文献交换关系的有200多个^③。

从1956年至1957年中科院与外国交换书刊、资料、论文数量的统计来看，同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换相比，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换尽管数量不多，但增长率较高。与此种状况相类似，这一时期中科院出版的译著尽管以社会主义国家的著作为主，但资本主义国家的著作数量增速更快，其中美国书籍占所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译著的比重逐渐增大。

表3 中国科学院与外国交换书籍、期刊数量统计（单位：册/件/篇）

	收到				寄出			
	社会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总计	苏联	总计	美国	总计	苏联	总计	美国
1955年	84690	78302	2819	18	14445	4414	1468	3
1956年	24327	15846	3049	75	15041	6306	1696	121
1957年	24637	15103	7277	132	24480	9317	3210	88

注：表格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朝鲜、蒙古、越南、民主德国、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英国、法国、瑞典、联邦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美国、瑞士、丹麦、芬兰、荷兰、挪威、奥地利、冰岛、葡萄牙、以色列、西班牙、比利时、加拿大、新西兰。

资料来源 《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年）》，第227—231页；《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年）》，第351—353页；《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年）》，第423—426页。

① 《科学情报工作（1958年文献汇编）》，第6、8、24、11、12页。

②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 《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年）》，内部印行，1957年，第251页。

③ 《科学情报工作（1958年文献汇编）》，第21页。

表4 中国科学院出版译著数量统计(单位:册)

	社会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总计	苏联	总计	美国
1955年	167	166	4	1
1956年	118	116	8	3
1957年	168	164	22	10

资料来源 《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年)》,第238—246页;《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年)》,第361—366页;《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年)》,第437—446页。

利用交换、购买的外文资料来编写科学新闻、专业科技动态、专业快报、文摘、索引、述评、译文集等,成为科研人员及科技文献机构的重要职责。为了打破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充分利用通过各种途径取得的外国期刊、文献资料,中国国外科技文献编译委员会于1961年10月成立。至1962年,该委员会共主持出版整本翻译外文期刊30种、选译期刊120种,翻译科技文献2万余篇、外国专利文献4万余篇,共约3亿字。此外,在全国范围内人数达2万余名的业余翻译队伍也被组织了起来。^①以中科院系统为例,院出版委员会及各类专业学会编辑出版的综合类科技期刊和专业性学报,不定期刊登科技人员译介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设备文章^②。院图书馆、科学情报研究所以及各专业性学会还编辑了《科学新闻》《世界科学》等大量有关外国科技进展的综合类期刊,以及20余种专业性科技译介类报刊,如《科学文摘》《期刊论文索引》《译报》等^③。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遇到困难。依据中央方针,科技文献工作也在体制、人员、业务等方面作出调整,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被划归国家科委管理。总的来看,在“文化大革命”前,各部门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文献工作者多方设法打破国际冷战时代西方对中国的信息封锁,为中国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等,以及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高新技术重大工程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④

值得注意的是,自1955年起,中国与美国互寄科技类书刊、资料、论文,开启了两国在国际冷战时代学术资料的交流^⑤。1958年,中

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写资本主义国家情报工作情况介绍时,专门详细介绍了美国的科学情报工作^⑥。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⑦成为中国选择性学习与借鉴的目标,诸如《美国的农业》(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1962—1963年),《美国汽车业托拉斯》《美国国际收割机公司的经营管理》《美国西屋电器制造公司的组织管理情况》《福特汽车公司的发展和现状》(国家经委企业局编,1964年),《美国原子能在农作物和植物科学研究中的利用》(中国农科院科学情报资料室编,1963年),《美国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经费及人员》《美国灌区盐碱化概况》(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1963年)等大量介绍美国技术管理等方面经验的材料,被当作内部资料在科研单位和科技管理部门刊行。

由上述科技人员交流、科技文献译介的情况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特别是从1956年开始,中国“向外国学习”的对象逐渐有选择地从苏联转向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更多国家,甚至美国也隐约成为被关注的目标。“和平外交”为这一时期的中外科技交流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从1956年到1958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建立起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文献体系,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随着我国外交、外贸、侨务、对外科学技术交流与文化交流的发展,可以直接从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情报与资料”^⑧。

① 武衡 《科技战线五十年》,第293页。
 ② 例如,有专门介绍美国气冷反应堆原子能动力设备文章。参见武霏 《美国气冷反应堆原子能动力设备的发展》,《科学通报》1957年第3期。
 ③ 参见《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年)》,第434—436页;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编 《我国科技信息事业的改革与创新:庆祝中国科技信息事业创建4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石化出版社,2001年,第33—34页。
 ④ 白国应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50年》,《图书馆》1999年第3期。
 ⑤ 参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 《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年)》,内部印行,1956年,第229、231页。
 ⑥ 参见《科学情报工作(1958年文献汇编)》,第135—138、162—168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页。
 ⑧ 《科学情报工作(1958年文献汇编)》,第1页。

四、余 论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领导人在建设思想上由“以苏为师”向“以苏为鉴”,甚至“以苏为敌”的转变悄然发生^①。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上拥有长处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可师法的“外国”,渐入中国领导人的视域。从各类外国专家的引进,科技人员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短期访问、培训、留学等多种方式开展的互动交流,以及通过国际互换与购买的科技文献跨国流动来看,在“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之下,中国在科技领域学习的对象逐渐从苏联转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从“向苏联学习”转向“向外国学习”,其间风雨不宁,路途坎坷。

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造成的“红色恐慌”余波未平,全面对华遏制与孤立的政策仍被艾森豪威尔政府奉为圭臬,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科技交往也受到严重掣肘。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科学国际主义精神(坚信中国不应与国际科学界和学术界隔绝,科学家之间的跨国交流能减少紧张、促进和平)的推动下^②,美国科学家、人文社会学者团体之力,成立了多个促进对华科学、文化、教育交流的组织。然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中美双边科技交流的前景变得晦暗不明,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科技交流也被迫中断。随着中美关系解冻,从1971年开始,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家、学者的到访不仅有了零的突破,而且日益频繁起来^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中国走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国家历史任务的重心和实现手段均发生转变:由通过军事对抗和意识形态斗争来实现并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完整,转到通过集中力量推动现代化、增强国家实力来实现民族复兴。科学技术现代化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而作为西方最先进科学技术代表的美国,被中国领导人视作获得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来源^④。美国的先进技术成为中国领导人向中国科技知识人员号召“刻苦学习”

的对象^⑤。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问时明确表示,自己即将开始的美国之行,“目的是要了解美国,向美国的一切先进东西学习”^⑥。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20余年间,尽管中国领导人“向外国学习”号召之所指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改变,但其内涵的共通之处却未曾改变,那就是要在坚持两点论的基础上,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和民族学习,永远不要“翘尾巴”。为了中国的富强,“一万年都要学习”。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 赵 鹏)

- ① 王海光《〈论十大关系〉文本的形成与演变及其经典化》,《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3期。
- ② 其他重要动因还包括相关美国科学家和学者反战思想、左派思想、和平思想等政治关切,以及他们对于中国的好奇,对于中国在农业、中医、植物学、地震学、考古学、气象学等专业领域成就的极大的专业兴趣。参见斯蒂芬·麦金农著,储峰、陈刚译:《1972年4月的一个凌晨与周恩来总理谈话的回忆》,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6),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368页;Kathlin Smith,“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Normalizing U. S.-China Relations: 1965-1979,”*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866, No. 1, 1998。
- ③ 典型事件是1971年5月,两位美国科学家——耶鲁大学植物学家高尔斯顿(Arthur Galston)、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家西格纳(Ethan Signer)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访华。参见黄仁国《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第71—76页。
- ④ 张静《邓小平与中美科技合作的开展(1977—1979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
- ⑤ 1978年12月26日,在新中国首批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出发前,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特意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第二天,《人民日报》编发的新闻标题是《我国首批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离京 方毅副总理勉励他们刻苦学习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力》。
- ⑥ 《邓副总理会见美国记者》,《人民日报》1979年1月6日。